

# 传媒引领舆情

## ——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周报》论析

徐方平 沈重<sup>1</sup>

**【摘要】**：《经济周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旨在恢复和加强中国经济建设的公开理论刊物。该刊“随着时代与人民一同前进”，多次呼吁避免或尽早结束内战，加快中国经济重建的步伐；多次揭露国民党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阻碍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主张经济民主和发展民族经济；多次组织召开上海经济学界专家和工商界领袖的座谈会，适时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为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言献策。《经济周报》在与国民党争夺社会舆情话语权、团结党内外广大经济学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 《经济周报》 经济民主 城市经济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3—0089—06

《经济周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旨在恢复和加强中国经济建设的公开理论刊物。在党的指导下，该刊十分注重与国民党争夺社会舆情话语权，团结党内外广大经济学者、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运用先谈经济后谈政治或明谈经济暗谈政治等策略，积极抢占舆论阵地，取得了党对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诸多成绩；发扬斗争精神，采取合法公开斗争与地下隐秘斗争相结合的灵活多变方式，通过举办经济座谈会和参加各种形式的聚餐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宣传党的经济方针和城市工商业政策，特别是宣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迄今为止，学界对《经济周报》的研究甚少。<sup>1</sup>鉴于此，本稿拟对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周报》在舆论引导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详加论述，或可补学界研究之不足。

### 一、《经济周报》的创刊及其概况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赢得抗战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新闻事业等中心开始由重庆转移到南京和上海。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迅速谋划《中央日报》等进驻上海、南京，抢占新闻舆论阵地。9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复刊，由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担任社长。同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sup>2</sup>上海是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国民党抓住《申报》和《新闻报》在抗战时期有过“附逆”的错误，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派遣国民党要员潘公展、萧同兹担任报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另外，上海《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正言报》等纷纷抢滩上海。一时间，上海成为国民党控制的新闻舆论中心。

面对国民党集团积极恢复其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媒体工作，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想方设法争夺舆论话语

<sup>1</sup>**作者简介**：徐方平，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62；沈重，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传媒引领社会舆情研究”（15AKS009）

权。1945年9月14日，仍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电报还强调应该派出像范长江、钱俊瑞等可以在南京、上海公开活动的著名新闻人士去那里活动，“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等都必须尽快落实。因为这些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sup>3</sup>

尽管《新华日报》在上海筹办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但是上海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上海的办刊办报工作却在积极推进之中。1945年9月21日，由进步新闻人士刘尊棋担任主编的《联合日报》创刊。10月9日，由黎澍担任主编、国际新闻记者孟秋江担任总经理的《文萃》创刊。10月10日，由郭沫若担任名誉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的《建国日报》创刊。1946年6月，1937年创刊于武汉的《群众》由重庆迁入上海出版，由半月刊改为周刊。因为在上海和南京出版《新华日报》遇挫，所以承担国统区中国共产党中央刊物宣传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群众》身上。《群众》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文件，刊载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新华通讯社的重要社论。在这一波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支持的复刊创刊活动中，《经济周报》不应该被忽略。

抗战胜利后，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张执一以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张执一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局文化和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主要负责上海工商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工作。他到任后，一方面广泛联系陈叔通、胡厥文等工商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争取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并先后创办了东方联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糖业公司和渔业公司等党的秘密企业，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和物资；另一方面，委托地下党员、曾经担任上海“大安保险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稽核的谢寿天和既是经济学者又富有社会活动才能的吴大琨负责筹办《经济周报》。同时，他还安排具有丰富经验的隐蔽战线工作者李正文参加《经济周报》的筹办工作。

对于必须迅速占领国统区报刊舆论高地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情形复杂的上海出版经济类的期刊杂志，找到政治上既比较可靠又具有较大影响的合法身份，从而发挥保护伞作用的人选至关重要。如果这样的人选还具备与期刊契合的专业素养更好。这种资源优化组合的“三位一体”格局，必将有利于稿件的组织、编审，有利于结交和拓展期刊的作者群，最终有利于提升期刊的质量，扩大共产党在上海等国统区的影响。张执一、谢寿天等几经物色，最后选定了符合“三位一体”条件的吴大琨和吴承禧先后担任《经济周报》的主编。吴大琨，东吴大学毕业，曾任全国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编辑《救亡情报》，并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上海分部的活动，支援新四军的工作。1942年被聘为暨南大学讲师、东吴大学副教授。不久，担任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的顾问。1945年加入共产党。<sup>4</sup>吴承禧，复旦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兴业银行襄理、副经理等职。<sup>5</sup>他的哥哥吴景超，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秘书、战时物资管理局主任秘书。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

1945年11月1日，《经济周报》正式创刊。在第1期封底的广告里明确说“本刊已呈请登记中”。这是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电报“先出版后登记”的要求做的。主编吴大琨、吴承禧，发行人张统桢<sup>6</sup>，总经销是上海书报社，定价50元。在这批8个广告中，有给予赞助的金城银行广告、有上海共产党自己经营的东方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广告。参与该刊编辑工作的有唐守愚、庄炎林和寿进文等。该刊设置了“短言”、“论著”、“讲座”、“座谈”、“国内外经济一周”、“每周商情”、“经济问答”、“国内外经济动态”、“工商呼声”、“经济统计”、“一周瞭望”、“读者园地”等栏目。每逢周四出版。第1卷有9期，第2、3、4、5、7卷都是25期，第6卷22期，第8卷16期。1949年4月21日，出版第8卷第16期后，因为国民党的压制被迫停刊。1949年7月7日复刊，继续原来的编序，为第9卷第1期，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第9卷第13期。因此，解放战争时期《经济周报》共出版9卷185期。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周报》继续出版到1954年11月，卷号和期号另外起序，共出版13卷265期。本文所论为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经济周报》。

## 二、《经济周报》策略性地充当政府与民间的“有力桥梁”

尽管《经济周报》是公开出版和发行的报纸，但是，为了在国统区的经济中心——上海站稳脚跟，避免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的打压，其《发刊词》低调而策略地阐明了其办刊背景和宗旨，彰显了共产党领导报刊的灵活策略。首先，它指出：8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最需要做的建国工作就是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建设，以“使民族生产力提高，民众生活普遍改善”，以确保“中国在世界民主集团中所辛勤获得的优越地位”，更要“把那积弱贫困的中国名副其实的跻入四强之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刊以“经济界一份子的立场来创办这一小小的刊物——《经济周报》，以为今后经济建设之一助”。其次，它希望既“把民间经济界的实况和舆论尽量的反映上达，作为政府决定经济施策时的一种参考”，也把“政府和领袖们的意见或期望通过座谈、访问或其他方式，转达民众，俾企业界在努力建设的过程中更能有所遵循”，努力成为沟通政府与民间意见的一条“有力桥梁”。<sup>7</sup>最后，它声称：“我们没有任何党派门户的偏见，我们不为任何集团或个人说教”，我们“只是以赤诚为国为人民的立场，本着不断研究的与学习的精神，希冀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稍稍的尽其推进的任务”，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共同努力，也希望跟着大家一齐前进！”<sup>7</sup>

能够证明《经济周报》尽量淡化共产党刊物的政治色彩，彰显“不为任何集团或个人说教”的办刊策略还有很多。该刊反复强调自己是“纯经济的周刊”<sup>8</sup>和“纯粹民间出版事业”<sup>9</sup>。为了营造合法的生存环境，该刊创刊号特别刊发了蒋介石的“箴言”——“建国的风尚，一是新，二是速，三是实”，号召国人“记住这一宝贵的箴言，‘荡涤旧染’，加速实干，向一个总的目标前进——建设一个独立富有的新中国”。<sup>10</sup>创刊号还刊发了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及实施细则——六中全会决议案》和《农业政策纲领》等。第5卷第4期发表了《论“宋子文政策”及〈经济改革方案〉》，传递和评价国民党政府的声音。该刊尽管是共产党领导的刊物，但是鉴于抗战胜利之初，国共两党关系尚未正式破裂，重庆谈判的和平成果需要维护，所以引用蒋介石有利于战后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箴言”十分必要，既是和平建国的需要，也是平安办刊的需要，更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体现了中共上海党组织在国共两党舆论战中的智慧。

《经济周报》既然愿意为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之一助”，那么，全面客观盘点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的状况，贡献对症下药的智慧之策，就成为其刻不容缓的工作。为此，该刊先后发表了《抗战八年来的大后方经济》（第1卷第1期）、《今后中国经济建设之展望》（第2卷第1期）、《读中间性各党派经济纲领后的感想》（第2卷第6期）、《稳定经济的基本原则与最低要求》（第2卷第9、10合期）、《略论当前中国的经济危机及其对策》（第3卷第4期）、《胜利一年的中国经济》（第3卷第11期）、《试论国大揭幕后的经济动向》（第3卷第21期）、《1947年的经济展望》（第4卷第1期）、《日趋恶化的我国经济》（第4卷第4、5合期）、《1947年中国经济总结》（第6卷第1期）等文章，试图对解决当时严峻的经济问题贡献力量。而主编吴大琨的长文《抗战八年来的大后方经济》乃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并颇具专业水平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的沿海都市特别是上海的经济，半殖民地性要强于它的半封建性，而大后方经济主要是半封建性的经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大后方的经济情形可以说是相当的进步了，而且正在向着现代化的大路上前进。”抗战中，大后方的民族产业资本虽然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但是却“还是始终被压制在一切前资本主义性的非生产性的资本下”。“中国必须向现代化工业化的路上走，可是旧的社会条件却在拖着它不肯让它向前走，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基本问题。”作者指出，“近几年来大后方的经济界最头痛的是所谓‘物价问题’”。最后，文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非遂行一种更合理的、互相配合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乃至各种经济政策不可”、“中国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等。<sup>11</sup>可见，该刊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同时，没有忘记自己必须要巧妙表达的政治态度。

毋庸讳言，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内战硝烟的不断加剧，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生产凋敝，物价暴涨，民不聊生。1946年5月19日，上海各经济团体在银行俱乐部举行欢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抵沪的会议。会议推定由《经济周报》社、现代经济通讯社和银行学会负责筹备“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简称“经团联”）。翌日，“经团联”成立，公推马寅初为名誉会长，《经济周报》负责人为总干事，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由参加的18个团体轮流主持。“经团联”共组织了28次聚会。后来，因为聚会“是由各个经济团体组成的，客观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经济周报》又单独举办了21次经济座谈会”。吴大琨、蒋学栋、吴承禧、季崇威、谢寿天、庄炎林、盛慕杰、孙晓邨等经济专家出席“经团联”聚会，为遏制经济态势的恶化献计献策。《经济周报》先后刊发了《论当前上海物价问题的症结》（第1卷第2期）、《财政属于人民——实施民主政治的一个起码条件》（第2卷第16期）、《“军事武装冲突”与中国经济前途》、《当前物价狂涨的特征及趋势》（第4卷第19期）、《谈所谓

“经济戡乱”》（第5卷第23期）和《一切要看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第8卷第1期）等系列文章，颇为深刻地分析了个中缘由，提出了一些挽救时局的举措。起初，专家们认为中国物价狂涨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方面，表现为“货币筹码之大量增加”和“货币流通速度之特别的加快”。<sup>12</sup>后来，专家们深入分析后指出：国民政府实施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货币量增加与商品量减少间的对立”这个最大矛盾。政府大量发行货币，给予“物价上涨的最大刺激”。为了支撑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政府推行“搜购军粮又外运”、“要了物资还要人”等政策，致使物价雪上加霜。由物价持续狂涨的趋势来看，将会“更带来经济的加速崩溃，向总崩溃的深渊又拖进了一大步”。最后，《经济周刊》以幽默和嘲讽的口吻，借伦敦《经济学者杂志》论述当时中国经济危机的话，来作为座谈会的结论：“只要内战存在，任何聪明的理财家，甚至亚当斯密斯在世，也无法挽救这种危机！”<sup>13</sup>

“经团联”聚会和经济座谈会的基本宗旨是尽可能团结广大经济学者和工商业者，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经济政策的实质，从而增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力量。这些活动的性质既有学术上的交流互动，更有政治上的统战共识。据参加《经济周报》编辑工作的盛慕杰回忆，《经济周报》在两者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团联”聚会，因为参加的单位较多，“《经济周报》起积极的影响作用”。经济座谈会以《经济周报》为主导，“能自由发表我们的见解，进行合法斗争。”每次“经团联”聚会和经济座谈会的发言，都被认真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周报》上且“很有影响”。有趣的是，当时上海有个叫方显庭的经济学家，编辑出版了《经济评论》，也是每周出版。该刊的出版，是否含有抵消《经济周报》的影响，“不敢妄加猜测”。但是，方显庭一再邀请吴承禧、盛慕杰给《经济评论》写文章，则给了《经济周报》宣传其观点和扩大其影响的机会。<sup>14</sup>

经济专家们的几十次聚会和座谈会，固然可以比较集中反映全国特别是上海工商界关于停止内战和复兴经济建设的诉求。但是，来自社会中下层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诉求未必能够在座谈会上得到比较全面和真实的反映。为此，《经济周报》先后发表了《上海经济界呼吁和平》（第2卷第24期）、《论全国商联合会当前与今后的任务》（第3卷第18期）、《摊贩问题的严重性》（第3卷第24期）、《被窒息的商业行庄申诉》（第7卷第5期）、《上海工商界怎样应付当前的苦闷》（第7卷第23期）和《当前工业界的苦闷及其出路》（第8卷第3期）等多篇稿件，呼吁政府关注工商业者的疾苦，关注舆情的风向标，稳定人心，稳定时局，努力而策略性地充当沟通政府与民间意见的“有力桥梁”。

### 三、《经济周报》旗帜鲜明地“随着时代与人民一同前进”

与共产党在解放区领导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可以公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同，《经济周报》作为上海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的经济刊物，在国共两党斗争态势尚未完全明朗前，其经济宣传的策略主要还是秉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努力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斗争，尽量扮演沟通国民党政府与民间“有力桥梁”的角色。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上海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为此，张执一和李正文等特别注意利用黄炎培领导的“民建”作掩护，巧妙地开展统战工作，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保持中立偏左就可以了，颜色不要太重”。1947年，针对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书记刘晓立即指示张执一启动香港《文汇报》的创办，上海的其他共产党办的刊物“也要做两手准备”<sup>15</sup>。这个其他刊物就包括《经济周报》。但是，随着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特别是1948年9月又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经济周报》宣传的策略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旗帜鲜明地“随着时代与人民一同前进”，宣传内容日益靠近《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更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和城市经济政策，为共产党顺利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变夯实经济理论基础，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1947年6月前，《经济周报》主要向广大读者介绍有关经济学的常识，阐释怎样研究经济学、怎样研究和应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先后刊发了《怎样研究经济学》（第3卷第14期）、《怎样研究现阶段工商经济问题》（第4卷第12期）、《论凯恩斯——逝世周年》（第4卷第17期）、《经济常识的研究方法》（第5卷第1期）、《介绍一本关于凯恩斯研究的专书》（第6卷第17期）等。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经济周报》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译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的《资本论勘误》一文，以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方式，巧妙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王亚南在致编辑部的信尾高兴地

说：“《资本论》中译本出版以后，前后曾发现了不少认真的读者，我们因此感到异常的兴奋。盼望将原稿发表，并附上数语，以志心感之忱。”<sup>16</sup>另外，该刊还以“答读者问”的方式，指导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小组如何学习，建议他们必须注意“经济学是不能孤立起来研究的，它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学习研究。<sup>17</sup>

如果说1946年《经济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复刊后的1949年7月，上海已经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已经解放，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了。为此，《经济周报》重点而有意识地安排第9卷第1期至第9期连载了《经济学的辩证法》，强调“提起经济学的辩证法，一定要联想到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马克思“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把唯物论的辩证法，应用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分析。因此，一般地说，这个方法也就是经济学中唯一的正确的方法”。<sup>18</sup>

在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1947年6月前，《经济周报》发表了《苏联战后经济建设》（第2卷第1期）、《苏联新五年计划概要》（第2卷第9、10合期）等少量文章。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的干涉，该刊从对世界各国经济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在安排发表苏联经济文章的同时，还比较多的发表了介绍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经济状况的文章，从而有理有利地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1947年6月后，《经济周报》先后发表了《苏联经济中的工业合作》（第5卷第21期）、《社会主义经济的胜利》和《苏联的工资与物价》（第6卷第22期）、《苏联新经济政策下的工业经营和合作社》（第8卷第15期）等多篇文章，进一步宣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成就。编辑部在发表吴清友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胜利》一文时，加了“编者”说明：“本文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N·伏兹聂辛斯基所著《战时及战后苏联经济》一书的第十五章，全书共八万余言”。该章通过比较分析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资本主义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斗争及其结果，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经济对法西斯主义的经济胜利，意味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最伟大的活力和进步性的表现及其伟大的前途。保卫此种制度，并发展它的雄伟的生产力，这是苏联各民族神圣的责任。”<sup>19</sup>

在宣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城市经济政策及其实践方面，《经济周报》着墨最多，先后发表了《山东解放区征收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卷第10期）、《论新民主主义合作经济》（第8卷第11期）、《如何处理城市经济》（第8卷第14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第9卷第1期）、《论新区的土地改革》（第9卷第4期）、《我对于人民银行的认识》（第9卷第10期）、《新民主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第9卷第12期）等约百篇文章。

1949年7月，复刊的《经济周报》特意安排了“解放后的上海经济特辑”，发表了孙毕敏的《解放后上海经济的动向》、季崇威的《解放后上海的工商业动态》、陈铭五的《解放后的上海贸易》、周有光等的《解放一月的上海金融》和《回顾解放以来的上海物价》5篇系列文章，并在期刊内封目录印上了从右上角到左下角斜着排版的5个大字“解放特大号”，对上海解放前后的经济进行了对比剖析。孙毕敏的文章认为：“今天的上海已不再是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们的天下了。它是中国的上海了，是人民大众的上海了。”这样，“上海的经济已经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走向了全民族经济的范畴。这是一个历史的伟大转变！”其发展的方向：一是执行“毛主席所时常昭示我们的城市经济政策，通俗的说，就是一个照顾到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二是“从虚浮的繁荣走向真实的生产”；三是“要求都在蜕变斗争与新生的过程中”。编辑部深信上海经济恢复的许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六百万市民自强不息的加紧团结起来，以最高的警惕作最周全的准备与最坏的打算，以与一切敌人落后分子作顽强不调和的斗争，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的。愿大家为建设新上海而加倍努力。<sup>20</sup>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亲自参加华北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薛暮桥回忆说：1947年3月，在河北邯郸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会议，开始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管理，会议交流了在实践中积累的许多经验。1948年4月，华北各解放区金融会议在石家庄召开，重点“讨论了支援战争、恢复生产与稳定物价三个问题”。薛暮桥受董必武委托起草了会议综合报告。同年8月，“中央批准了这个综合报告，并要求各解放区遵照执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就带领部分同志前往刚解放不久的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市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帮助上海解决恢复生产、保证供应、稳定物价等困难”<sup>21</sup>。在上海，许多金融投机商曾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军管会和上海

---

市人民政府，通过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银元之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调配粮食和棉纱等主要物资的“米棉之战”，比较成功地接管了上海。这“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sup>22</sup>大事。

时代在变，《经济周报》也与时俱进的在变。其变的表现之一就是希望民族企业家跟上时代的新变化，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尘埃落定。该刊发表的《谈民族资本家们今后所应具有的新风度》一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因为“人民革命的光芒已经照耀了大地”，所以“今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弥漫当前的革命风暴，非但无所用其杞忧，而且应当予以欢迎”。你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自己与怎样积极的去发挥企业家的精神，为提高民族生产力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准而努力”。同时，在“意识形态今后应当首先抛弃旧民主时代的个人主义，而处处应以人民大众服务为前提”。你们必须“要养成苦干与虚心学习的精神”，“应当向群众学习，生活要简朴、严肃，眼光要看得远，胸怀要放得宽”。<sup>23</sup>

《经济周报》不仅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加强宣传，还借用上海的其他平台开展工作，对上海工商业者产生了积极影响。1946年9月，在地下党员邝日安、葛一飞等筹备下，上海工商经济研究会成立。《经济周报》编辑庄炎林和邝日安当选为该会理事。《经济周报》主编吴成禧、编辑寿进文和张锡昌等，《经济周报》的作者孙晓邨、娄立斋等均被上海工商经济研究会邀请作报告。许多职业青年和工商业界人士经常向研究会“询问演讲日期，索取听讲券，情绪非常热烈”，以至“每次都座无虚席”。研究会“把每次讲演的讲稿加以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周报》上”。<sup>24</sup>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我方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斗争一样，不可能一帆风顺。1949年春夏之交，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北平、天津等华北大城市，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按照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四面八方”<sup>25</sup>的城市经济政策，积极恢复城市经济能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此时“京沪一带的报纸上，时常刊载着关于平津方面或中共治理下城市的零星消息，不是说工商业如何萧条，就是说对外贸易停滞怎样不利”。这样，“难免在国内外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与误解，认为中共的确是不善于治理城市的，中国生产和贸易的繁荣非依赖外国人的协助不可。”针对“外国通讯社，尤其是美国的合众社、联合社”等“有计划的宣传攻势”，为了说明事实真相，《经济周报》在第8卷第14期及时刊发了《如何处理城市经济》《试论今后的贸易管理》和《华北贸易对外管理局规定天津已结汇进出口货处理办法》等文章予以辩驳，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文章认为：“平津物价相当稳定，尤其是粮食、燃料、花纱布等日用必需品物价，已渐下跌。工业品和进口货的价格亦应对外贸易的进展而逐渐回跌”，“工业生产照常进行，工厂陆续复工，政府以全力鼓励职工增产，甚多工厂已超过解放前的生产率。”文章坚信：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处理好事关城市经济命运的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和稳定物价“三大枢纽”，“城市经济就可能获得进步和走上轨道”<sup>26</sup>。这些文章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媒体和国外通讯社对我们党管理城市的歪曲报道。

同时，“既恨国民党，又怕共产党”，也是解放战争后期上海、北平等地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普遍存在的心理。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包括《经济周报》《文汇报》等报刊媒体和聚会讲座等多种路径，宣传了党的城市经济政策，才在较大的程度上消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的种种顾虑，其中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许多中小工商业者下定决心留在了上海，一些出走的也选择了回归。例如“面粉大王”荣德生、“火柴大王”刘鸿生等。据一位叫贝谛华的上海工商业者回忆说：北平解放后，“上海国民党报刊歪曲宣传，污蔑共产党”。1949年春，我在一次聚餐会上听了“张友新同志介绍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后来“又到顾树桢、顾翼然同志介绍天津解放后，共产党对工商业的政策和城市人民安居乐业的情况，从而使我安下心来”，迎接上海的解放。<sup>24</sup>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统区坚持出版了近4年的《经济周报》，以“拨开云雾，方见天日”的历史担当，以“随着时代与人民一同前进”的开拓进取精神，既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及其与之休戚相关的政治、军事等国家前途的方针大政，揭露国民党的日趋腐败与不得人心，反对内战，倡导经济自主和经济民主，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又在政府与工商界领袖及广大民众之间积极传递信息，释疑解惑，努力充当“沟通双方意见的一条有力桥梁”<sup>7</sup>；还想方设法宣传经济学常识，告诉读者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为民请命，多方面反映他们的呼声；更审时度势，及时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

政治经济学，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及其实践，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经济周报》除了在上海等国统区销售外，“有一部分转销解放区”，影响逐渐扩大，真正发挥了引领社会舆情的作用，成长为“真正作为人民喉舌的刊物”<sup>27</sup>。因为《新华日报》和《经济周报》等媒体的推动，马寅初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上海“经团联”在马寅初66岁寿辰欢庆茶会上，献给他“马首是瞻”的纪念旗<sup>28</sup>，从一个侧面彰显了《经济周报》等共产党领导下的刊物的舆论引导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团结统战的卓越成效。

#### 注释：

1 少量提及的论著有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高成兴的《国际经济学家——吴大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乐刚的《吴大琨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侯桂芳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1期。少量回忆性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有盛慕杰的《经济日报社的合法斗争和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006年5月，华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作序的《张执一文集》。该书上册第9、143、497、619页对《经济周报》的创办有所叙述；杨勋等的《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唐金成的《红色保险的掌门人——谢寿天》，《上海保险》2011年第6期等。

2 转引自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3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4 吴大琨，解放后历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乃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5 吴承禧，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华康区行计划处处长、上海财经学院教务长、《学术月刊》常务编委、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及上海市政协常委。

6 张统桢，目前信息未知，他是否为张执一，目前没有查到资料加以证明。

7(8)(29)《发刊词》，《经济周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1月1日。

8(9)《编后》，《经济周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1月1日。

9(10)本刊编辑部：《“经济周报”两周岁》，《经济周报》第5卷第18期，1947年10月30日。

10(11)《短言》，《经济周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1月1日。

11(12)《经济周报》第1卷第1期，1945年11月1日。

12(13)本刊编辑部：《论当前上海物价问题的症结》，第1卷第2期，1945年11月8日。

13(14)本刊编辑部：《当前物价狂涨的特征及趋势》，《经济周报》第4卷第19期，1947年5月8日。

14(15)盛慕杰：《经济日报社的合法斗争和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

---

页。

15(16) 墨诞：《隐秘战线》，海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8、304 页。

16(17) 王亚南：《资本论勘误》，《经济周报》第 2 卷第 20 期，1946 年 5 月 23 日。

17(18) 《怎样研究经济学》，《经济周报》第 3 卷第 14 期，1946 年 10 月 3 日。

18(19) 吉羊：《经济学的辩证法》（一），《经济周报》第 9 卷第 1 期，1949 年 7 月 7 日。

19(20) 《经济周报》第 6 卷第 22 期，1948 年 5 月 27 日。

20(21) 《经济周报》第 9 卷第 1 期，1949 年 7 月 7 日。

21(22) 薛暮桥：《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现代财经》2000 年第 3 期。

22(23) 《陈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 页。

23(24) 吉：《谈民族资本家们今后所应具有的新风度》，《经济周报》第 8 卷第 8 期，1949 年 2 月 24 日。

24(25) (28) 工商经济研究会史料编写组：《上海解放前后的工商经济研究会》，《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 3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8、171 页。

25(26)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3 页。

26(27) 倪迪光：《如何处理城市经济》，《经济周报》第 8 卷第 14 期，1949 年 4 月 7 日。

27(30) 本刊编辑部：《“经周”三周年》，《经济周报》第 7 卷第 18 期，1948 年 11 月 4 日。

28(31) 杨勋、徐汤莘等：《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1 页。